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三年第一辑(总第五十一辑)

江夏春秋·人物选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三年第一辑

江夏春秋·人物选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武昌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洪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青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武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1993年1月出版

出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刷厂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发行：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地址：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字数：150千字

印数：1—4000册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01—6号

定 价：3.00 元

目 录

李达校长治校述略·····	宋腊梅 (1)
一代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缅怀刘介愚院长·····	龙振泉 (8)
人民教育家吴贻芳风范永存·····	陈 忠 (16)
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	刘祖芬 方 燕 (25)
回忆唐义精校长·····	李家楨 (30)
穷毕生心血于教育事业的段奇璋·····	刘晋文 (35)
武昌瞿目女校首任中国籍校长刘惠芳·····	冷 静 (40)
理论经济学家朱剑农·····	陈文科 (43)
一心扑在蔬菜事业上的杨惠安教授·····	罗禹初 (50)
李求实烈士的少年时代·····	徐忠影 (54)
京剧大师谭鑫培·····	陶 晖 孙绍彭 (57)
忆著名金石书画家曹立庵先生·····	杨坤炳 (63)
伍禾后半生断忆·····	贺 捷 (69)
湖北医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朱裕璧·····	许国经 (75)
著名中医李绍陵·····	万文谟 王 谦 (82)
一纱厂的创办人李紫云·····	任延平遗稿 (85)
工商巨子徐荣廷二三事·····	徐山珍 徐中孝 (92)
武钢创始人李一清·····	马金山 (95)

望子成农 择婿唯农

——记三十年代青山实验区区长张植安

..... 张次农 陈振应	(102)
财政金融能手沈质清	童维军 (107)
怀念曹美成先生	吴先铭 (111)
项英——早期工运主要领导人之一	寒 星 (118)
魏宸组与巴黎和会	魏需颜 (123)
黄吉亭与日知会	余遂生 (127)
我的父亲熊子民	熊增慧 (131)
记沈肇年先生	林 奇 (137)
著名爱国人士杨经曲	树 新 (140)
忆原武昌县委书记梁家瑞	汤立规 (147)
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前前后后	许大鹏遗稿 (151)
致力于统战工作的领导干部乔子平 张怀慰 吴彬斋	(156)
我所知道的傅碧人先生	郑小敏 (161)
湖北省会警察局长 胡慎仪起义的经过	武昌区公安分局史志办 (165)
工贼周三毛点滴	武公志 (173)
雷寿荣在伪组织中的起落	程 华 (176)
汉奸肖春庭	陈克斌 赵于丹 (183)
后 记	(186)

李达校长治校述略

宋腊梅



老校长李达 1890 年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武汉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常委，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又曾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等职。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诬陷,于1966年8月含冤去世。老校长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光辉事迹很多,现仅就他在武大活动几件事略加记述。

(一)

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的高等学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3年任命李达同志为武汉大学校长。老校长来武大后,为了把武大办成宣传马列主义、高学术水平的社会主义新型重点大学,坚决依靠学校党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教育事业的改造和发展。老校长一贯认为要办好高等教育,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师生员工的头脑。只有师生员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才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才能把学校办好。所以他一到武大,便立即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首先,组建了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并亲自兼任主任,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随后,他创办了马列主义夜大学,组织教师和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为了创办好马列主义夜大学,他不顾自己患有肺气肿、胃溃疡等多种疾病,从繁忙的校务及社会活动中抽出时间,亲自拟订教学计划,选拔任课教师,指导教师备课,并且亲自担任哲学课的讲授。每次讲课前,他总是认真写好讲稿,印发给大家。这一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使师生受益匪浅。“武大的一些教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由他教的。”历史系一位老教授也深有感触地说:“在夜大学听李达校长亲自讲唯物辩证法,深得教益。作为一个在解放前长期接受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教育熏陶的知名人士,解放后能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胜任思想性较强的历史学的讲授,饮水思源,我不能不感谢李校长的教导。”

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理论队伍,1956年,他重新创办了武大哲学系并兼任系主任。为搞好哲学系他还亲自编撰教材,抓试验班,为该系学生讲哲学课。

为了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1959年,学校成立了以李达同志为首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四个教研室,由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分别兼任各教研室主任。同年,他在《新武大》发表《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专文,针对当时专业理论工作的落后状态,联系当时的实际,指出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需要下苦功夫去研究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认真地钻研党中央的政策决议。

由于老校长是坚持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办学的,所以他对教育战线上的那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仅有很强的辨别力,而且有坚决抵制的勇气。他在来武大之前,在中南局开会时听到介绍武大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他就感到那样搞是要出问题的。事实证明当时确实犯了“左”的错误。他到校后,采取了很多措施纠正这些错误,包括亲自登门拜访受了委屈的同志。1958年,由于他坚决贯彻高教六十条,使学校走上了正轨。1961年,他提出了武大要在10年之内赶上国内先进水平,进而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的奋斗目标,使武汉大学出现了一股赶超国内外先进学术水平的热潮。

(二)

老校长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教育路线。他办大学的指导思想,立足于培养人才,要求重视和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提倡师生团结奋斗,互相尊重,互相爱护,造成一种在学术问题上自由讨论、互相切磋的良好空气。他经常讲“一个大学,一个系办得好不好的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学者,也就是有没有一批学术上的带头人。世界上许

多著名的学派和学术中心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老校长为把武大办好，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注重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在1953年武大的国庆节纪念会和开学典礼上，他根据中央精神阐明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指出：高教必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全心全意忠实于祖国和人民事业，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

1955年，中央高等教育部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贯彻这个方针，老校长主持召开了第五次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作了《关于提高教育质量坚决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报告和大会总结，着重指出：“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关键在于教师树立全面负责的思想。”他说：“提高教学质量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问题，业务课、政治理论课、体育课的教学质量都提高了，教师的政治思想水平都提高了，都能全面负责，都能关怀学生在业务、政治、身体三方面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有保证了。”

1961年下半年，武大的教学秩序得到恢复，学校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校园内早晨到处是一片学外语的朗读声，图书馆阅览室座无虚席。这时他又指出，现在“我们学校的主要矛盾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培养和提高师资是当务之急，是学校能否办好的关键”。他多次召开校务委员会和系主任会议，研究师资问题。他反复强调，师资提高是基本问题，殷切希望各系为青年教师创造条件，加以培养，不断通过教学实践和学术活动，大力提高师资水平，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使武大在“三至五年内，八至十年内，涌现一些名教授”，在学术界出现几个有地位的专家、学者，把中年骨干充实起来。他非常关切地说：“武汉大学在国家大学占第几位？我很注重这事，有人说我们是第5位。要努力迎头赶上。”又说：“我设想10年以后，武大水平线上的教员数以百计，然后赶上国际水平。”这些讲话，对

把重点大学办成教学和科研中心起了重要作用。

老校长很重视武大的科研工作。他认为学校除了搞好教学之外,还必须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他从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指出,科学上没有长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各位系主任,拿出六分之四的时间带个头,向学术方面进军。为了组织领导好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老校长总是大力宣传和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他说:“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所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议,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还说:“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应该自由讨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认识向前发展,使科学工作者逐步掌握客观真理。”

更为可贵的是,老校长不仅是学校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也是模范实践者。解放后,他撰写并出版了近百万字的有独特见解的论著。当时,他身患多种疾病,但仍日以继夜地在理论战线上继续发挥一个老兵的作用。他还亲自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积极开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并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5年,武大决定正式出版发行《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和《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以推动武大的科学研究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并成立了学报编辑委员会,老校长亲自兼任编委会主任。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后,他积极响应,主持制订了武汉大学十二年规划草案,并在这年6月,举行了全校首届科学讨论会。以后,科学讨论会不断举行,提交讨论的科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每年都有很大提高。他特别抓住1963年武大校庆50周年的纪念活动,提出要把它变成“科学科研成绩的大检阅”,要求各系的教研室、实验室,每个教师以及有研究能力和兴趣的工作干部,尽可能完成计划,拿出有水平的学术论文和科学研究著作来。这样在50周年校庆时,提交讨论的科学论文及展出的科学著作之多在武大校史上是空前的。

(三)

老校长为了把武大办成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赶上国内外的先进水平,他十分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并大力培养人才。他说:“要办好一个学校,就要有几个名教授,办好一个系就要有几个拔尖的人”;“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水平才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水平,是反映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成品’、‘出人才’的最基本条件”;“必须把师资提高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把它“列为学校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他特别注意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广开才路,到处招贤纳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充实学校师资队伍。

他在创办武大哲学系时,为了罗致人才,亲自写信与有关大学联系,甚至亲自登门求贤。现在已是博士导师的陈修斋教授,当时是北大的青年讲师。为了把陈请来哲学系任教,他亲自找陈谈话。每次去北京,他都亲自登门访问准备调来武大或由武大派往北京进修的教师,或者挨家挨户去拜访,或者派车接来,在他自己的寓所相聚畅谈。陈修斋调来武大后,他亲自过问陈的住房问题,陈到校的第二天,他亲自去看望,使陈大为感动。李德永教授原是天津的一个中学教员,老校长听说他擅长哲学史,就把他调到武大哲学系来。这位教师全家都在天津,爱人又是家庭妇女。他了解到这一情况,主动把路费寄到天津,帮助李德永全家搬迁到了武大。有一次,李德永和几位教师到老校长家里拜年,回去时,老校长把他们送出门后,对身边的助手说:“你看,李德永瘦多了。”这句话传知李德永后,使他久久不能忘怀。李德永说:“我平时和老校长很少接触,而他却连我胖瘦都注意到了。老校长对教师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有位老师的爱人在人民大学学习,武大有关部门准备与校外的中学联系,打算安排到校外工作,老校长知道后说:“何必要别人跑呢?”他亲自过问,终于设法把这位老师的爱人调来武大。领导如

此关心教师,教师们很感激,决心集中精力搞好教育与科研。

对于青年的成长,老校长极为关心,他通过各种方式在青年中发现和培养人才。1958年,有位在化学系做团总支书记的青年干部,在武大校刊上发表了一篇学习辩证法的文章,老校长看后,认为这位青年有培养前途,就把他调入哲学系,以后又派他到人民大学进修。这位同志现在已成为哲学系有名望的教授。法律系有位助教,曾协助他写过《谈宪法》的文章,老校长很赏识他的才华。这位助教不幸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十分惋惜。当这位教师生活困难时,老校长以私人名义给他以津贴并鼓励这位教师加强思想改造,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这位教师没有辜负老校长的一片苦心,现在已成为全国有名望的宪法学教授。

老校长也很尊重专家教授,经常找他们促膝谈心,征求他们对办学的意见,政治上充分信任,生活上多方照顾,工作上努力创造条件,帮助配备助手,使每个教授的专长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当时即使是全国大名鼎鼎的所谓“右派”,他也一视同仁,有时还把他们请到家里谈心。这些教授背着“右派分子”的沉重包袱,思想苦闷,工作不大胆。他就经常开导他们,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好好工作,使得他们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由于老校长善于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共同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奋斗,使武大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武昌区政协供稿)

一代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缅怀刘介愚院长

龙振泉

长期担任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的刘介愚同志,离开人世已一年多了,但华师人,特别是受过他教诲的一代人,无不从内心深处怀念他。他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为他数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行动在人们的心目中真正树立了一位老教育家和人民公仆的形象!

殚精竭虑,把师院办出特色

1954年初春的华中师范学院,才由中南地区三省二市有关高校调整合并不久,矛盾重重,上级派刘介愚同志来校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学校工作。为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把中南地区的这所重点师范学院办出特色,他在到职讲话中就响亮地提出:“共同培养团结树,使之盛开教学、科研花”。他针对学校亟待解决的问题,用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来统一党委一班人的思想。通过各种途径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在贯彻学校的重要决定时,他经常深入基层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从不搞一言堂,或个人说了算。这种领导方法,不仅充分发扬了民主,培养了干部,而且使广大师生感到亲切,乐于与他接近。

50年代中期,学校各级领导和系主任,多是党外知识分子,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刘介愚一再强调,党内外各级干

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必须保证有职有权。他还在高校率先建立了党、政、工会联席会议,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以便互通声气,共同配合。为了促进师生相互信任,他来校不久,就取消了由学生填写的“教师教学意见表”,要求主讲教师主动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学生对教学上有要求,可直接向主讲教师提出,也可向系里反映,求得合理解决。这样很快消除了师生间的某些对立情绪,也增强了系室主动处理问题的积极性。

“人心齐,泰山移”。不到一年时间,团结和谐的局面初步形成,学校的面貌大为改观。

刘介愚十分注意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各级领导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教师管教管导,机关后勤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教学为师生生活服务,因而学生能安心勤奋地学习,胸怀崇高理想,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不少学生还主动争取到祖国最艰苦又急需的地方去,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青春年华。

刘介愚善于把上级的政策结合学校的实际贯彻执行。1962年上级布置在学校开展“新三反”,他认为学校的最大问题在于培养的人才适应不了国家的需要,于是召开会议,武装骨干,在学校开展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学风教育”。在教育中他明确提出,老师要传共产主义思想之道,授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之业,还对师生员工的行为规范作出明确规定,要求人人遵照执行。在贯彻中央制订的《高教60条》时,他又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纳入到以中学实际为基础,以科学理论为主导的轨道上来,从而使学校在提高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前提下,保证了师范规格,使学校在“高”的基础上,办得更具师范特色。从1990年湖北省评选出的394名特级中学教师看,华中师大的校友就有210人,占这批特级教师的53.3%,而这些优秀教师的绝大多数,又是“文化革命”前的毕业生,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的国家高教部、教育部都充分肯定华中师范学院
的办学成绩。1977年邓小平同志讲师范大学要办好时，还专门
提到湖北有个刘介愚。

介愚同志抓高等师范教育是具有特色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正确估计知识分子，是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前提。介愚
同志认为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立场观点都有所转变，认识水平
也有提高，但同时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变，
往往要通过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自身的业务实践，才能逐步完成，不
能操之过急；且学术问题，认识问题，一定要与立场问题严格区分
开来，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讲真话。

1957年以后，学校运动接连不断，刘介愚尽量注意向积极方
面引导，使之少伤害知识分子。如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学校在他
的掌握下，一直未开展系统批判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批“祖师
爷”，挖“祖坟”等活动，使一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免受更大的冲
击。尽管如此，在1962年贯彻广州会议精神时，介愚同志仍亲自带
头，并教育各级干部到那些受过各种冲击的专家们的家里去赔礼
道歉，直到这些老师气消了，不愿意再听到赔礼道歉声为止。

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专家想调离学校，刘介愚亲自上门听取意
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如现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的张舜徽
教授，曾一再要求调北京工作，经反复做工作，对他提出的要求，都
尽可能给予解决，让他在教学科研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终于使张教
授安下心来。又如理科有的教师，认为学校实验条件差，难以施展
所长，希望调往条件较好的单位。介愚同志就出面筹集资金，为教
师们施展所长创造条件，终于使这些同志在科研上作出了成绩。有
的专家在他的关怀下，弄清了历史疑点，使之在三线建设的考察中

发挥了作用。

刘介愚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出发,每逢节假日,都要亲自到教授家走访,与他们交知心朋友,听取他们对学校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有时春节期间,大雪纷飞,各家老小都在围炉取暖,而老书记却在山坡小道上履冰踏雪,去给专家们拜年,问寒问暖。记得1961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有一位教师从前苏联学习归来,老书记在自己家里用定量供应的物资,代表学校请这位青年人吃了一餐便饭以示欢迎,使这位青年教师感激不已。这些看似简单的一桩桩、一件件小事,真如涓涓暖流,温暖着教师们的心田,老书记的心,与教师们的心贴得更紧了。

由于刘介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尊重关心知识分子,使不少专家学者在条件艰难的情况下,仍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地耕耘着。贯彻《高教60条》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教学质量得到了提高,科研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出版专著50余部,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包括译文)500余篇。其中张舜徽、詹剑峰、李修睦等教授的著作,均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精心培养新生力量

精心培养新生力量,是刘介愚的又一突出特点。他常对人讲,青年才是祖国的未来,要接受诸葛亮的教训,放手让青年人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早在50年代,他就注意给一些年轻人的肩上压担子,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受磨炼。1958年为了加强基层,各系都成立了党总支,他就选定了一批年纪不足30岁的、懂专业的党员走上党总支书记和副系主任的岗位,还挑选了一位20来岁的青年党员任党委常委。这些措施,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也可说是大胆的创举。他非常注意提高党政工作人员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水平,一再讲,作为党政干部,要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以己之昏昏,

使人昭昭。文化革命前,党委办公室还常有几个专、兼职干部组建的调查研究班子,他们到系室帮助总结经验,或研究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提高,以指导工作。这对掌握情况,互通情报,提高干部政策水平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了提高干部的写作能力,他请有名的汉语专家高庆赐教授为机关干部讲授现代汉语和公文写作。他教育党员,要从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模范作用,吃苦的事走在前头,得利的事走在后头。在一次调整工资时,党内外各有一位同志工作成绩都突出,都应该升级,可只有一个升级名额,刘介愚毫不犹豫地决定,让党外同志先升。

在刘介愚的关怀下,华师的新生力量,曾是成长较快的。早在50年代,学校就率先确定了一批中青年教师作为学科带头人进行培养。发现有较大培养前途的青年人,就给他们压任务,为他们冒尖创造条件,既注意发挥校内老专家的作用,以老带新,同时利用各种机会争取校外名家指点,使他们在学术上迅速成长。有时重点培养对象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老书记就强调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要全面的发展的看人,不要出一点毛病就认为不行了。到现在学校正副教授达500以上,硕士点42个,博士点7个,不少专家跻身于世界名人录,这些人才的成长,是与老书记的关心培养密不可分的。学校的党政干部在文化革命前成长也较快,因此中共湖北省委曾派人来校总结干部成长的经验。当时从学院调出的干部,多先后走上司(局)和省厅级岗位,也有的成了副部级领导。学校选定的接班人,都成了重点院校的一把手。

这里还有一个华师人广为传说的真实故事:老书记去世前两年,经人介绍请了一位年轻保姆,当他发现这位青年人热爱音乐时,就热情鼓励她自学成才,除保证她有充分的时间练唱外,还亲自托人为她请指导老师,并从经济上予以资助。直到老人家去世后,这位青年人才抱着对老书记的无限深情回到了老家。